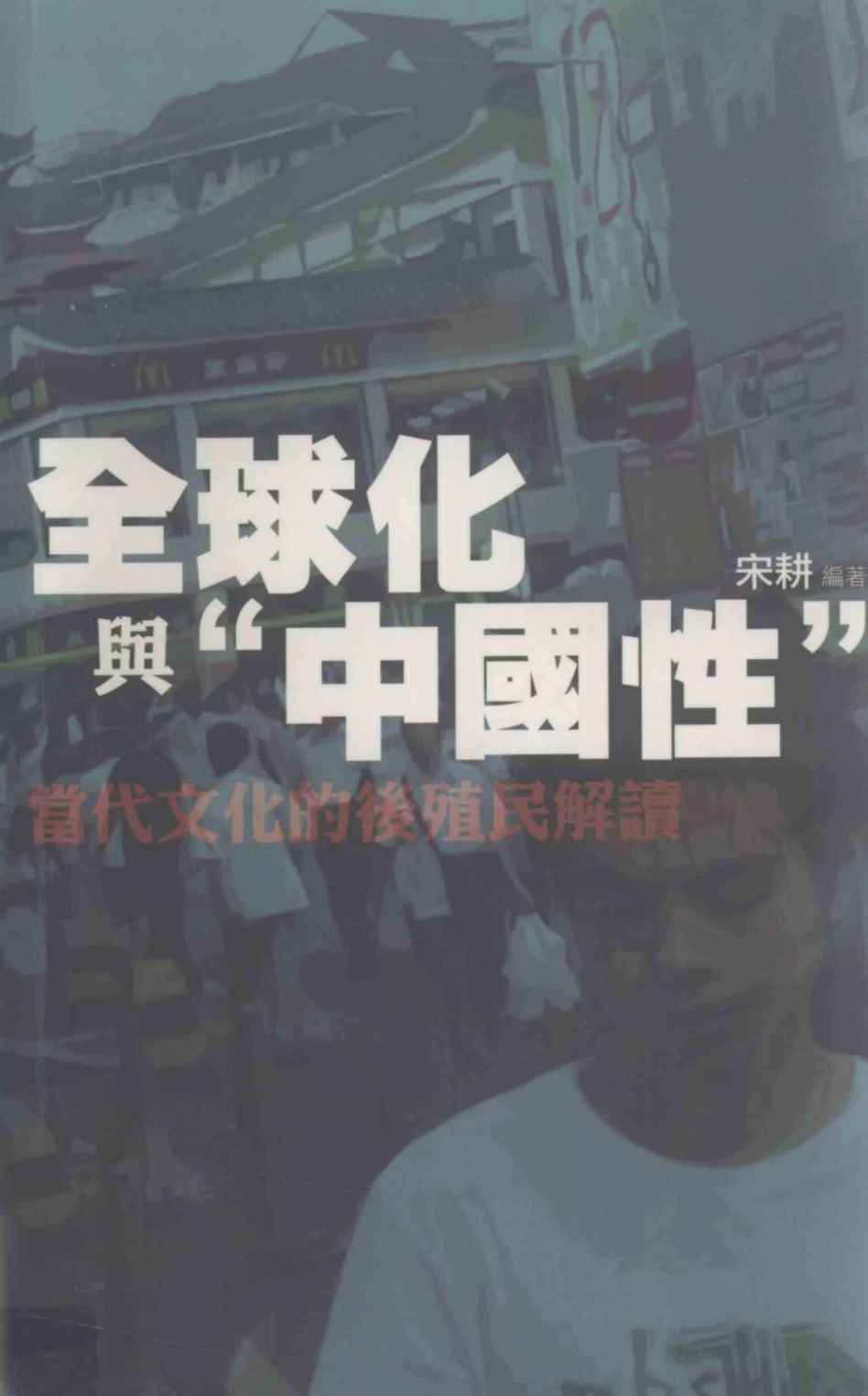




全球化 與“中國性”

宋耕 編著

當代文化的後殖民解讀

宋耕 編著

全球化與“中國性”

當代文化的後殖民解讀

全球化與「中國性」的關係糾葛，是當前文化研究的一大議題，也是關注世界文化發展脈絡的一個焦點。中國經濟的崛起與文化的復興與創新，涉及全球化過程的普世性、地域性與歷史傳統變遷等問題，與人類文明發展的前景息息相關，是每一個當代知識人都必須思考，而無法迴避的。本書從不同角度探討此一重大議題，對當前錯綜複雜的文化現象與潮流，提供了理性批判與深刻的剖析，值得鄭重推薦。

——鄭培凱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www.hkupress.org

全球化與 “中國性”

當代文化的後殖民解讀

宋耕 編著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6

ISBN 978-962-209-818-3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本社提供網上安全訂購保障
<http://www.hkupress.org>

康和印刷制作有限公司承印

序

這本論文集收錄了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美國等地的中國學者的文章，其中有新秀，也有資深學者，大都在文學系任教。這是一部非常及時的文集，對於中文學術界的文化研究這一正在蓬勃發展的領域，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我應主編宋耕博士邀，為之作序，深感榮幸。所錄文章，均經過主編和出版社編輯、評審專家的精心甄選，嚴格把關，反復修改。各位作者無論是老手還是新人，都恪守學術規範，掌握大量材料，對文本條分縷析，知微見著，展現了良好的學術風範。目前中國學術界建設嚴謹學術規範的呼聲日增，本文集在這個大氛圍中出版，尤為值得稱讚。

中國近三十年來的轉型，在中國這個民族國家而言是改革開放，在世界範圍是全球化，這兩大主題相互呼應，難分軒輊。換言之，這是一個天下大變的時代，中國的轉型與世界的轉型同步。要想認識中國的轉型就一定要認識世界的轉型，沒有世界眼光和視野就無法理解民族國家和本土的變化。知識和學術乃是大轉型中的一部，較之現代化早期的工業化時代，在最近三四十年來的作用日益攀升。知識和學術本身的變化更加令人瞠目。當代學術思潮中的突出一點，便是對知識和學術的基本預設和範式的理論自覺和反思，其中集大成者，當冠之以“後學”的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諸理論莫屬。如今在社會科學仍佔主流的學術流派和範式，已經深深感受到後學理論的挑戰，並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回應。而人文領域之中，具後學背景的理論研究，則已堂皇佔據主流，在文學研究領域裏尤為明顯。

除範式變化之外，學科研究物件的變化也非常迅猛。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學創作跟歷史、哲學和其他人文社科範疇的大

翻譯、大進口、大反思浪潮相互呼應，推波助瀾，造就了五四之後的又一個“文學革命”高峰。但處於全球化大範圍中的這場中國新文學革命，在政治的壓力和經濟的誘惑之下，迅速溶入了音像與視覺消費文化一統天下的時代。八十年代“文化熱”造就的一大批人文學者（特別是文學學者）紛紛與時俱進，或轉入其他相近學科如傳媒研究（中國的新聞傳播學者中有文學系背景的比例，當為世界第一），或轉移研究物件（中國第五代和第六代電影研究的龐大國際學術隊伍，絕大多數是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文化研究這一新興領域大大拓展了文學研究範圍，自然成為了現當代文學專業學者的首選。這裏面有各種因素，當然也有各種困惑和兩難。用英語世界的慣用比喻，文化研究成為一把大傘或大籃子，什麼都可以裝進去。無論是理論的宏觀論述，還是各種文本的細讀，不同學科、不同理論學派的論爭，均可在這把傘型籃子裏找到位置。不過文化研究在西方的語境中產生，自有其特定的歷史、政治與意識形態背景和特徵，有揮之不去的左翼批判色彩。把中國的研究物件、中國的特定語境放到這個籃子裏，必然要凸現中國的特色，於是就有從學術範式到理論預設、從選題到作研究到行文的過程中，無時無刻不在提醒和困擾著學者的種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立場的矛盾、對立、衝突、交錯、融合。然而，超然、客觀、中立的立場本身已經是被解構了的神話。折衷主義的語焉不詳、顧左右而言他、玩弄理論概念、故弄玄虛，也早在學術圈內和圈外為人詬病。所以做文化研究雖有種種益處，也必然面臨種種困境。宋耕博士的前言對這些困境和兩難有精湛的分析，這裏毋庸贅言。本論文集的各篇精彩文章，呈現了作者各自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立場，讀者可以充分瞭解。本文作為序，不該本末倒置，寫成一篇讀後感，但仍願借機略談一點感觸。

首先是文化研究的跨學科特點。文化研究這把大傘下面，好像是各種學科의 交匯和集市。但仔細一看，仍大部分局限於文學研究看家本領的文本細讀和對宏大敘事的更宏大的理論概括這兩點。這兩點是基石，不可丟。但是是否也需要借鑒、介入其他學

科，如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如果我們的物件是消費文化、影視傳媒，其中社會影響力、商業利益、資本運營、公共政策與政治權力的關係、受眾的構成、回饋等方面的問題，均意義重大，單憑學者個人的文本解讀和個人觀點，是遠遠不能說明問題的。如果用文本細讀方式來分析“小眾化”、精英色彩強烈的先鋒藝術電影，或許可忽略不計本來就為數不多的觀眾回饋。但是同樣來解讀大眾流行的電視劇，不顧及收視率這個關鍵因素，則使得文本解讀流為各抒己見的個人主觀意見，無法真正說明電視劇對不同層次受眾產生的廣泛社會影響、折射出的多元社會心態。單純以文學研究、文本細讀方式研究大眾文化和傳媒，其弊端顯而易見。社會科學的田野調查、訪談、問卷、資料分析等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對於主要擅長文本解讀的人文學者來講，熟練運用社會科學的實證方法斷非易事。不過通過跨學科團隊合作方式，也並不是不可以做到的。

第二是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借用傳播學的概念，是指學術研究的課題應該如何選擇，課題即議程，對於研究的範疇和重點，均起了制約作用。中國文化研究以當代文化現象為物件，但是在選擇研究課題和大理論框架時，常常隨西方中國研究的議程設置聞雞起舞。我們是否需要關注中國的熱門，確立當下中國的重大話題？這些話題存在於中國各種官方論述、大眾傳媒、知識界、通俗流行文化中，跟西方的中國議程常常大相徑庭，作為立足中國的文化研究，對此應有所察覺。譬如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個大話題，常常跟本土化(*localization*)列為一對矛盾。須知這種思考，並非傳統的“中西”或“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而是在全球或國際(*global or international*)與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傳統博弈之間，引入了本土(*local*)或區域(*regional*)的第三概念。對於許多國家和地區，本土的概念常常跟少數民族和族裔、族群(*ethnicity*)的文化認同聯繫在一起。中國當然也有這方面的問題，引起西方學者極其濃厚的興趣。但在中國之內，本土的觀念更涵蓋了不同地區，如沿海和內地、東部、西部、中部、東北等等的文化發展差異。這些差異由於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而日益加

劇，少數民族問題也是其中的一部份。在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博弈中，關注“本土化”問題，有助於理解中國社會與文化的不平衡、差異、多樣性、零散化的複雜狀態。總之，像全球化、民族國家、本土化等概念，出處是西方的，到了中國，則要適應特定環境。制定議程設置是很複雜的，但舉足輕重，需要花大力氣來思考。

宋耕博士在前言中提出要思考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務是什麼？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作為人文學科的一支，文化研究在大轉型時代的當務之急，恐怕依然是保持人文學者的批判立場和社會參與感和責任感，這是文化研究的主旨，無論在何種語境下，均不可放棄。作為中國學者，或許還有另一面的挑戰，就是理論創新和學術範式創新。前面提到的議程設置、知識和學術的大轉型，均有這層意思。中國在大轉型中首當其衝，所有的變化都對現有的來自西方學術規範、認知模式、知識範式提出了挑戰。西方學術模式泰半出自西方社會實踐和經驗，但中國的轉型實踐已經使中國由被動的理論模式消費者，逐漸演變為理論模式的生成者。中國社會轉型中的種種“變異”和“特例”，對於來自西方經驗的“普遍規律”提出了大量挑戰，激發了更深層的理論探索和思考。在社會科學各領域，許多中國學者正和西方同事一道探索轉型期的知識模型。文化研究具有學術的前瞻性和強烈的自我反思色彩，因此為人文學術的創新提供了有利契機。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跨越地區、國家和語言文化的疆域，在不同的學術空間遊弋，本論文集即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劉康

美國杜克大學

2006年3月20日

目 錄

劉康教授序	vii
1. 導論：全球化與“中國性”——文化研究在中國的兩難處境 宋 耕	1
2. 休閒文化與文化資本 王 瑾（著）、包亞明（譯）	19
3. 全球化語境下中國電影的文化批判 王 寧	51
4.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大陸媒介與大眾文化 范 紅	67
5. 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 周小儀、童慶生	85
6. 全球化和中國文化討論中的民族主義分歧 徐 賁	101
7. 全球化或本土化？中國“女性主義”面臨的挑戰 吳燕娜	129
8. 中國文化中“陽剛”建構的後殖民解讀 宋 耕	153
9. 後現代文化語境中的歐洲中心主義、現代性與中國文化 焦慮：從 007 系列電影中的華人形象說起 毛思慧	177

10. 漂泊流離的同志漫遊者：論王家衛《春光乍洩》 中的九七／回歸陰影 林松輝	203
11. 自我出演・個性經濟：解讀全球化語境下的“超級女聲” 和“芙蓉姐姐”現象 肖 慧	213
12. 城市觀光：香港旅遊業的視覺論述 彭麗君	233
13.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記憶、思考和爭論： 解讀“浩劫”話語 高默波	247
14. 創傷記憶與藝術批判的可能性：重讀九十年代的 “毛熱”現象 葉雲山	261
15. 從“九一一”事件看中國融入全球體系的二元思潮 沈旭暉	279
後記 宋 耕	291
作者簡介	293

1

導論：

全球化與“中國性”—— 文化研究在中國的兩難處境

宋 耕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頭，也是愚昧的年頭；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

—— 狄更斯《雙城記》

這是全球化的時代，也是本土化的時代。

—— 編者

“文化研究”的興起和發展是近二三十年來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所面臨的最大轉變和挑戰。雖然從廣義上講，一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都是關於“文化”的研究，然而狹義的“文化研究”卻意味著思維方法和研究範式上的全新突破。學術領域的文化研究在方法論上主要受西方批評理論的影響，其中最核心的特徵是對意識形態問題的警覺和批判性思考。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

義和後殖民主義是文化研究的三大理論源流。它們關注的側重點雖然各有不同（分別集中在階級、性別和國家／民族三個問題上），但在本質上又是相通的，那就是對邊緣話語和邊緣團體的關注、對霸權的顛覆和對權力本質的批判。因此，“文化研究”雖然很難用簡單的語言給出定義，但它的特徵卻很容易辨認：它關注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消費，打破傳統的精英／大眾文化的界限，提供對文本的政治性解讀以及對歷史的文本性認識，側重對文化身份的批判性思考等等。¹同時，文化研究在本質上還是一種跨學科和跨文化的研究，它打通了傳統的學科界限。正如宋文里所說：“文化研究的特色就在於此——它是人文／社會研究這個總體的反學科，它坐落在靜態的客觀知識對面，在欲望和恐懼的拉扯之間，最後它出現為對於權力的理解，和破解。”²文化研究的興起可以看作是在全球化、商品化時代日益邊緣化的人文學科重新整合，努力“自救”的一種策略。因為它使學術研究走出書齋，前所未有地與普通人關注的熱點問題、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緊密聯繫在一起。用霍爾(Stuart Hall)的話說，文化研究的使命是“使人們理解正在發生什麼，提供思維方法、生存策略與反抗資源。”³但吊詭的是，它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方興未艾的文化研究正在日益成為傳統學科的掘墓人。當一切都歸於“文化”時，傳統學科的生存本身也就面臨了危機。例如，在今天各類文學領域的學術研討會上，討論最多的話題就是——“文學”的死亡。

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文化研究，現代邏輯以及全球化理論〉一文中指出，“對於文化研究而言，語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語境”，因此文化研究可以被視為“一種語境化的關於語境的理論”。⁴中文語境中的文化研究呈現出和西方不同的面貌。對文化研究理論著作的譯介和用中文寫作的文化研究論文可以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末，進入90年代以後文化研究的方法日益對傳統學術構成巨大的衝擊。文化研究在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既造成了相似的衝擊波，又因三地政治語境的不同，關注的側重點明顯有所不同。由於英文在學術界的主流地位，香港可能是兩岸三地最早接受文化研究影響的地方，並且其研究也最接近西

方學術的特色。香港的文化研究在97回歸前後達到高潮，其關注點主要是電影、城市文化、大眾／普及文化以及後殖民與本土文化／意識等。⁵而台灣除了日益高漲的對後殖民、身份和文化認同問題的興趣外，其“酷兒”研究、性別研究、網路文化的研究近十幾年來似乎特別火熱。他們也翻譯了不少理論專著，充實了中文語境的批判資源。⁶在中國大陸方面，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被介紹進來主要是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的事，90年代中後期，“文化研究”開始成為大陸最時興的辭彙之一。由於大陸特殊的政治環境，文化研究的核心問題主要是圍繞著“現代性”與“民族性”的問題。例如近期有不少文章討論西方後殖民理論和中國（新）民族主義思潮之間的關係。薩伊德的《東方主義》、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和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等書成為全球化時代中國語境中文化研究的最受關注的著作。同時，在某種意義上說，大陸的文化研究也是最偏離西方語境中的研究特色的。陶東風曾指出：“中國的文化批評普遍地具有情緒化、隨意化、隨筆化的傾向，學術水準總體而言不高。”⁷實際上，文化研究在兩岸三地的不同風貌正是生動地反映了文化研究的政治性。不同的歷史經驗、現實環境，與國際“接軌”的程度、政治權力對學術的干預程度的不同等等因素，決定了上述差別。

本書所收錄的14篇論文，基本上都是未經正式發表過的。這短短的14篇文章，涉及的領域卻包含了國際政治、國際關係、歷史、文學、電影、性別研究、旅遊業、媒體與大眾文化、廣告與視覺藝術、網路文化以及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等，集中體現了文化研究的跨學科特色。其中不少議題是當前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門”話題。同時，作為一本學術著作，本書力圖反映當前中文語境中文化研究的理論特點。在這本薄薄的集子裏，上述兩岸三地文化研究的不同特色也多少有所體現。將這些文章對照起來閱讀，可以使我們更加全面、清醒地分析和探討全球化背景下中文語境中文化研究的現狀和出路。這也正是編輯本書的目的之一。此外，由於一些論文是從作者自己的英文著作改寫／翻譯而來，

實際上這本書也是溝通中文和英文學術背景的一個嘗試。而所有的論文都圍繞著全球化和“中國性”這樣一個中心論題，其理論背景便是文化研究在當代中國的兩難處境。

二

如前所述，文化研究從本質上講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精神的延續和發展，是產生於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土壤的一種政治性的批評方法和反抗策略。由於中國大陸迥然不同的政治環境，勢必導致被“移接”到中國當代社會中的文化研究產生某種“變異”，甚至是面臨一種尷尬的兩難處境。事實上，近期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學者已經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並展開了討論。⁸ 例如，陶東風曾經這樣評論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批評：

中國的文化批評在學術上雖然沒有學到西方文化研究的功夫，但是在價值取向與政治傾向上卻又常常亦步亦趨地照搬西方，這就是一味地向左轉，批判資本主義。殊不知西方國家推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文化研究作為一種邊緣的批判話語，向左轉是應有之義。然而我們至少不能簡單說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即使批判資本主義也應當與西方有所區別。換言之，既然文化批評具有特別強烈的政治色彩，那麼，對它來說，準確地勘定當代中國的權力關係（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就顯得殊為重要。⁹

文化研究，特別是後殖民理論，在中國的兩難處境表現在：一方面，它借鑒和使用西方最“新潮”的批評話語，呈現出反權力、反壓迫的外貌；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特殊的權力關係，它又在某種層面上得到官方認可甚至在本質上扮演權力同謀的角色。因此，徐賁指出，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論與方法在進入中國後，由於對不同的語境缺乏應有的反思與警醒，致使西方理論在中國本土產生了極大的錯位與變形，甚至違背了西方文化研究的精髓與靈魂。¹⁰ 而在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後殖民批評與第三世界批評同中國（新）民族主義之間的同謀關係。

有關“現代性”與“中國性”問題的討論是大陸文化研究的核心熱點問題。“中國性”(Chineseness)的問題最初是由海外學者提出的，強調其話語性與建構性。¹¹而中國知識份子在90年代所提出的“中國性／中華性”，乃是作為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一種替代和挑戰，對西方霸權的一種對抗，這在某種意義上繼承了官方話語關於“民族性”的論述，又明顯具有文化相對主義的色彩，在90年代以後的中國充當了（新）民族主義的理論資源。¹²王一川在〈中國文化現代性：從現代1到現代2〉一文中認為，中國文化現代性是包含若干長時段的超長時段過程。從晚清至20世紀70年代構成中國文化現代性的第一個長時段即現代1；從1980年代至今則是中國文化現代性的第二個長時段即現代2。現代1的中心使命是按西方話語標準而尋求中國文化的世界化。現代2的中心使命已不再是按西方話語標準去尋求中國文化的世界化，而是在全球化世界種種陌生的他者話語中興立中華文化話語及其獨特個性。這不是要全盤否定和拋棄文化現代1的“西化”遺產而回歸古典，而是在同時承認現代1的歷史性得失的前提下，立足於當今世界語境而在世興我，即在全球化世界努力興立中華文化的自我形象及其獨特個性。¹³這種認為中國向西方學習、追求普世主義“現代性”的階段已經告一段落，中國在21世紀的目標將是通過重構和弘揚“中國性”來重新尋回自我，進而為世界的發展提供另類“現代性”的觀點，實際上延續了早些時候提出的“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的樂觀論斷，反映了在中國大陸經濟起飛、國際地位日益提高的時代背景下的膨脹的民族自豪感和對“中國／世界”關係的重新定位。這種文化上的“反霸權”主義和相對主義，同政治、經濟上的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相呼應，在某種程度上成為1992年以後中國官方話語的思想“同謀”。¹⁴本來，全球化與本土意識之間的關係，是21世紀各個文化，特別是第三世界文化，面臨的共同課題和思考焦點，但是在中國，由於民族主義的強勢地位和官方背景，就使得這一問題更加複雜化，也使文化研究的處境更加尷尬。

在思想學術領域，“新左派”的崛起是90年代的重要特徵。¹⁵和教條主義的“老左派”不同的是，“新左派”反映了知識份子對今天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權力關係以及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反抗”。他們以“自由左派”的面目出現，強調其邊緣性和批判性，然而實際的政治功能卻是在一個還沒有脫離“左”的集權統治的社會裏，呼籲再向“左”轉，包括從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時代背景重新看待毛澤東和文化革命，為其“翻案”。而他們在理論資源上也大量引用“西馬”，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化相對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理論。這些在西方被視為“激進”的理論，在中國卻為“保守派”所用。事實上，“左”與“右”、“激進”與“保守”乃是相對的概念，完全取決於不同的歷史語境。在今天的中國，這些好像正好和西方掉了個個兒。這也正是文化研究所面臨的兩難困境。而在民族主義的崛起、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問題上，1992年後的中國社會也呈現了許多獨特的“特殊性”。

1989年以後中國社會主流思潮的演變，是當初許多學者始料不及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使館事件、中美南海撞機事件、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和釣魚島爭端等，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中國民間反美反日的浪潮。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將其稱為中國的“新民族主義”。他認為民間的反西方情緒是官方認可和鼓勵的，例如關於鴉片戰爭以來民族恥辱和“洗雪國恥”的教育、關於美國霸權主義的妖魔化描述以及關於中國經濟崛起和民族復興的過分樂觀和具有煽情性的宣傳等，都直接導致民族主義思想的膨脹，但同時這種已經被中國年輕一代內化了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一旦演化為民間的力量，又很可能會失去控制，進而破壞共產黨對政治話語的官方壟斷，甚至威脅到其政權的穩定性。¹⁶

網路空間的飛速發展打破了官方對話語的壟斷。網站成為宣洩民族主義情緒的主要管道。在今天中國大陸的各類“論壇”上充斥著抵制日貨、收復台灣等言論。然而，和“五四”時代或抗日戰爭時期的民族主義不同的是，由於網路空間的虛擬性和匿名性，今天的“民族主義”實際上表現為一種後現代的喧嘩，一種政治正確的、安全的嘉年華。網路上的一篇文章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

更不可思議的是大學生那些無限膨脹的、變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尤其是反美、仇日、大漢族、大統一的狂熱情緒。他們狂熱地閱讀《中國可以說“不”》這類極端主義宣傳品。對於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中美飛機相撞事件，他們義憤填膺，上街遊行、焚燒美國國旗；對於“九一一”事件，他們則與全世界罪惡的恐怖份子一起彈冠相慶。但若有機會得到赴美簽證，他們則會興高采烈、毫不猶豫。他們熱血沸騰地支持動用武力“解放”台灣，但若要他們穿上軍裝衝鋒陷陣卻又絕對不可能。¹⁷

在去年（2005年）4月北京、上海等地爆發的大規模反日示威中，電視鏡頭上出現了“中國人民很生氣，後果很嚴重”的大幅標語。看過由馮小剛執導的、充滿商業廣告的賀歲片《天下無賊》的人，都會忍俊不禁。因為這句“經典”名言，出自劇中葛優飾演的賊頭之口：“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黎叔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對這樣一句“經典”對白的“戲仿”，出現在示威隊伍裏，使義憤填膺的“愛國主義”平添了一份後現代的嘉年華色彩。正如許紀霖所說，“這種自上而下蔓延開來的反西方主義，”是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¹⁸

關於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悖論關係，汪暉曾經指出，“當代的民族主義政治與傳統民族主義存在重要的差別，與其把它看作是全球化的對立物，毋寧把它看作是全球化的副產品。”¹⁹在今天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膨脹和中國日益融入全球化資本主義似乎並行不悖。我們不妨以北京舉辦2008年奧運會這樣一個民族主義符號來看這一問題。北京“申奧”的成功實際上是以中國在人權等問題上向西方妥協作為代價的。而且北京奧運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中國“全球化”的速度和決心。用中國自己的話說，就是最關鍵的是“與國際接軌”的問題。官方發起的全民學英語的運動等，目的都在於縮小中國和“世界”的距離，使中國更加融入“世界”。然而，另一方面，奧運會又成為官方宣傳“民族自豪感”的絕好素材，被賦予強烈的民族主義的意義。奧運會不但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象徵，甚至還有點兒重溫昔日中華帝國“萬邦來朝”的美夢的意味。